



人民出版社

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

# 融合

胡克森 著

中原、蛮夷两种文化之比较

春秋争霸与民族文化融合

战国时期文化融合之特征

秦皇朝的兴亡：中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全面较量

汉帝国的建立：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 融合

胡克森 著

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



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陆丽云

封面设计:曹 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 胡克森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

ISBN 978-7-01-008676-7

I. 融… II. 胡… III. 中华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春秋时代~秦汉时代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761 号

## 融合

——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

胡克森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5.75

字数:525 千字

ISBN 978-7-01-008676-7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王子今

序





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sup>①</sup>儒学正统的“一统”观，于此得以提升到自然定律和历史规则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董仲舒正是因为提出了相关的扩张孔子思想文化影响力的论点，于是成就为儒学大师，“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汉唐大儒皆莫能及”<sup>②</sup>。从春秋时期到秦汉时期，完成了从“一统”文化愿望的提出到“一统”政治实践的成功，进而到“一统”国家定式的确立的历史演进过程。胡克森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就是一部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并予以文化总结的有重要价值的学术专著。

“统一”之前的文化形态是否能称作“分裂”还可以讨论，但是以“走向统一”归纳这一历史阶段的主体文化面貌，可能是适宜的。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竞争、经济交往、军事征服和部族融合，作者以“中原文化”和“蛮夷文化”之相互关系为主线进行考察。联系到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sup>③</sup>的感叹，看起来这好像是在沿用一种传统的思路。然而与近数十年来同一时段历史文化研究的主流成果比较，新的学术视角的优异是显然的。尤其讨论“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不可以忽略与族群构成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的。

作者引录了《越绝书》卷7《越绝外传·陈成恒第九》越王见子贡时“此乃僻陋之邦，蛮夷之民也”的谦词。“蛮夷之民”和“僻陋之邦”确实存在对应关系。作者还注意到《荀子·王霸》所谓“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历史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多位于文明程度处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围地区，这些政治实体的迅速崛起，对于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的“中国”即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说明，自然也是研究“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时不可回避的主题。

① 《汉书》卷56《董仲舒传》。

② [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35《吾道异端之辨上》。

③ 《论语·宪问》。

从东周至于秦代，秦国在西部地区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由被动而主动的演进历程，影响了历史的基本走向。对这一历程的描述和解说，不少学者倾注了心力。作者在《商鞅变法的成功：秦西戎文化优点的充分发挥》一节以及《帝制的建立及其戎狄文化特色》一节中的有关论述，都可以给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以有益的学术启示。

这本书的立意，是要说明“春秋至秦汉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在文化上的深层原因”。作者认为，“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而春秋至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奠基阶段，又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民族的形成时期。”这样的总结，是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的。

确实，在统一的政治实体形成之前，对统一理想化已经成为诸多政治学说共同的倾向。而体现出早期“大一统”意识的对统一政体蓝图的绘制，已经透露出后来人们称作“专制”的色彩。《左传·昭公七年》可见无字的话：“一国两君，其谁堪之？”他还说：“《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孟子·万章上》也引述了《诗经》中的这一句，以及孔子“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话。不过，孟子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解释，与我们一般的理解略有不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礼记·曾子问》和《礼记·坊记》，然而都写作“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管子·霸言》写道：“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一书，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 267 次。其中多见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令行禁止于天下”等。很显然，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成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而管理天下之方式，思想家们已经作出了强调“强”“制”的设计。



就追求“统一”的实践而言，虽然孟子曾经提出了“不嗜杀人者能一之”<sup>①</sup>的主张，秦的统一，却并不是遵循孟子“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sup>②</sup>的政治方向指导和“仁人无敌于天下”<sup>③</sup>的文化原则建议，而是通过严酷战争手段和军事方式，通过大规模“杀人”最终实现的。这就是李斯等人所谓“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sup>④</sup>。“法令由一统”，明确了统一国家的管理，也依恃高压威慑，依恃极度集中的强权。李约瑟讨论中国古代思想时，对于指导秦政的法家思想有这样的评价：“（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sup>⑤</sup>这样的意见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符合中国学者的习惯思维，却也并非全无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最后写道：“自秦汉以后，统一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常态，或者说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分裂只是一种变态，一种支流，追求统一，维护统一，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这样的认识，是许多学者所赞同的。作者引了范文澜先生的论点：“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十六国割据，汉族地主不是主要发动者，北朝与金是外族侵入，当别论），而统一则是长期的、正常的。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呢？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sup>⑥</sup>诚如胡克森所说：“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

① 《孟子·梁惠王上》。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孟子·尽心下》。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⑤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王铃协助，何兆武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页。

⑥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中国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中国通史》教材、读本以及秦汉史专著大都基本上持这一观点。如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当然更是如此。”有的学者说：“秦合并六国，成为跨地区的统一的国家。此后，合了分，分了合，反反复复。但总的趋势是，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逐渐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强化。可以说，统一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趋势。”<sup>①</sup>有的学者说：“在中国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统一的局面，也存在过分裂的时期。表面上看，历史的发展似乎是在分合的循环往复中进行的。实际上，只要我们作认真分析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国家统一的不断加强和巩固。”<sup>②</sup>这些论点，都是值得重视的。

对于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时代比较，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葛剑雄先生说，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4%，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45%。如果从有比较明确纪年的西周共和（前841年）算起，前者约占3%，后者约占35%。论者所谓“第一标准”，就是“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所谓“第二标准”，就是“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sup>③</sup>。这样看来，对于中国古代“统一”和“分裂”所占年代的比例，形成了相反的判断。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真正分裂”的时间“只有100余年”。论者说：“自秦朝至清朝的2100年间，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十个王朝，国家基本上都是统一的，时长约1600余年。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与金等四个时期是分裂的，时长约500余年；可是其间有400年为民族对立和战争时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并不一样。如除去这400年，则只有100余年是真正分裂时期，即‘魏

① 刘家和：《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光明日报》1997年9月16日。

② 陈高华：《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光明日报》1997年9月16日。

③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10月版，第79页。



蜀吴三国’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而‘五代十国’也有重大的民族问题存在。总之，从上述情况来看，在这2100年间，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方面；分裂是中国历史的支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非基本方面。”<sup>①</sup>将“分裂”的时段限定在“只有100余年”，看来是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什么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既然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就不应该将因“民族对立和战争”导致的“分裂”从中国历史中随意剔除出去。对于这一问题，林甘泉先生以分析十六国时期历史为例所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十六国时期，旧史家称为‘五胡乱华’，但从我们今天看来，匈奴、羯、鲜卑、氐、羌都是我国历史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活动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sup>②</sup>葛剑雄先生也曾经指出：“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sup>③</sup>林甘泉“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实现统一的时期”，“是七百三十多年”的表述<sup>④</sup>，可能是多数学者愿意接受的。

对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存在和历史意义，以往的评价有时有过高的偏向。其实，我们在认识这种所谓“常态”，所谓“主流”的时候，还应当注意到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大一统”，其实是有一定的合理度的。不能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情况下，规模越大的“统一”都必然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都必然有益于当时文明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大一统”集权政治得到强化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时反而会出现停滞乃至倒退。正如林甘泉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发展

① 张传玺：《中国古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02页。

② 林甘泉：《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统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41页。

③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40页。

④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第337~338页。

所起的破坏作用，有时比促进作用更大。”<sup>①</sup>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分裂割据时期的地方经济文化，或许可以得到突出的发展。我们还可以引用林甘泉先生的分析。他指出：“我们强调统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不是说，在分裂割据时期，历史就毫无可取之处了。无论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或宋辽金时期，在不同割据政权地区，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以南方而言，从孙吴经东晋南朝、五代十国到南宋，经济的开发就有显著的成效。太湖流域的苏、杭、常、湖等州，在宋代已是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腐朽的南宋王朝，正是依靠富庶的南方经济，才勉强支撑了一百五十多年。”<sup>②</sup>田余庆先生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分裂时期的小国，为了自立自存，不得不勉力开发一些道路河渠等工程，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sup>③</sup>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问题，应当避免简单化的凡“统一”即盲目颂扬，凡“分裂”即绝对否定的倾向。

“统一”和“分裂”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也许相关的争论还会长期继续，但是研究者的努力正在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接近历史真实，这是可以持乐观态度的。而胡克

①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第174页。

② 同上书，第341～342页。

③ 《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2月版，第397页。

森《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一书的面世，对于推进这种学术进步的意义，也是可以肯定的。

王子今

北京大有北里

2009年3月22日



融合  
RONGHE

——  
春秋至秦汉时期  
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

世界著名设计大师设计作品集

#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立意过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发展的古老文明,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而春秋至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奠基阶段,又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民族的形成时期。因此,探寻中华民族统一传统的终极原因,尤其是探讨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根源,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如果从历史上追溯,早在西周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有了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意识,正式见诸文字的,应该是孔子作《春秋》所采取的历史观。如公羊高在解释《春秋》第一句话“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sup>①</sup>后世学者基本认同公羊高这一说法。如董仲舒就是根据《公羊传》来建立他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的。而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主张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有不同,孟子等主张的是建立统一的封建等级式的君主国家,而法家主张的是中央集权式的专制国家。后来法家的统一理论在秦始皇手中实践成功,而后又迅速败亡,因此探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同时也是长治久安的皇朝,成为西汉朝野的一个重要话题。而贾谊将这一探讨推向理论高度,他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揭开了对秦之所以统一又迅速灭亡的深层次讨论,而后这一问题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翻出新意,从而使其具有永久的学术魅力和政治内涵。当然,真正将这一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的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致说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自建国以来形成三个高潮,国外的研究状况也可纳入这一框架之内进行介绍:

第一个阶段是始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史学界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范文澜先生《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中国的原因》一文指出,秦汉时期

<sup>①</sup> 《春秋三传》,《四书五经》第九种,中国书店1985年第2版,第36页。

之所以能够完成民族大统一，并使统一成为长期的、正常的社会发展状态，其根本原因就是汉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他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十六国割据，汉族地主不是主要发动者，北朝与金是外族侵入，当别论），而统一则是长期的、正常的。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呢？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sup>①</sup>

而后，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中国通史》教材、读本以及秦汉史专著大都持这一观点。如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当然更是如此。其实，中国统一形成的原因与中国专制统治的建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这场讨论同时涉及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国外关于中国统一形成原因的一些观点被陆续介绍进来。一般来说，国内外关于中国统一形成或说中国专制主义建立的原因有这样几种看法：一是因为古代社会治水的需要，这最早来源于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谈到因为治水的需要而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的一段话：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

<sup>①</sup>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中国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后收入《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



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sup>①</sup>

然后,他又说,这种要求,在西方,可以由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因东方的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在这里,马克思只是谈到印度时将其扩充到整个亚洲,并没有单独提到中国。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其他许多文章中将亚洲的这一现象概括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水利工程的国家化,即人们所称的治水文化。此后许多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在内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作为中国古代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后来外国一些学者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情况下肆意歪曲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追述一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在《东洋哲学史》中讨论关于“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问题时提出“灌溉排水的水利事业(及可航的运河的修筑),是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一个物质基础”<sup>②</sup>,“人工灌溉及与之密切关联的集约性的小农经营,是规定着作为农业的干预机关的集权的中国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sup>③</sup>这一观点后来遭到我国学者的批判,认为这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作宣传的。<sup>④</sup>当然关于秦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原因是由治水引起的,即治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出版于1957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② 转引自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④ 同上书,第6页。

该书自称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为基础,认为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东方国家都是“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而这些协作又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由此形成东方专制主义。该书1989年由徐式谷等翻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翻译过来之后就遭到我国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魏特夫既不懂得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又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理论进行了严重歪曲。<sup>①</sup>该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原因的论述,他说:

治水耕作的土地尽管占全国耕地面积不到一半,产量仍然可能超过所有其他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治水农业居于相对经济优势的地位。在中国统一前夕,秦国修建了郑国渠,从而大大巩固了它的农业内地(现在的陕西);这一行动使秦国比其他诸侯国家富足而强大。后来,秦国统治的整个地区(原注:除了郑国渠地区以外,这还包括四川的富足的灌溉平原。)占到帝国面积大约1/3,而据班固记载,它所拥有的财富要占帝国所有财富的60%。司马迁认为,以前秦“富十倍天下(其余地区)”。这两种说法都无法予以证明,也不必加以深究,但是这些说法都证明我们所说的一种强有力的治水农业制度的相对经济优势。<sup>②</sup>

- ① 我国史学界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上世纪的90年代,而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上,主要代表性论文有廖学盛《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古代希腊社会》(《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张弓《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古代的治水与水利农业文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周自强《从古代中国看〈东方专制主义〉的谬误》(《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苏凤捷《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和魏特夫对它的曲解与歪曲》(《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林甘泉《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王敦书、谢霖《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实质的曲解——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发表其他刊物有影响的还有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涂成林《东方专制主义理论:马克思与魏特夫的比较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等。
- ② [美] 卡尔·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当然对于这种治水的需要导致中国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应该说还是有着严肃的学术探讨的,如董恩正先生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中谈到北方为何比南方更早进入阶级社会时提出了六点原因,其中一点就是北方水利工程的需要导致国家的产生。<sup>①</sup>

其次是关于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侵略的抵抗导致专制主义的建立和统一形成的观点。刘昶就提出:“(农业民族)若要保护自己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战胜游牧民族的侵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依靠大规模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力量。而在当时,这种组织方式只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式的。”<sup>②</sup>刘昶这一文章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因理论方法上的原因,我将其安排在第一阶段。以上主要是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分析秦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的原因,当然也谈到民族文化融合,但不占主要部分。

第二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近代西方的许多新的史学方法传入我国,从而引起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对春秋至秦汉这段历史,尤其是秦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继而迅速灭亡问题,许多学者从文化方面进行了新的探讨。如林剑鸣先生《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sup>③</sup>,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等文章都是从文化价值观方面来探讨秦皇朝兴亡的力作<sup>④</sup>,而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又论述了楚汉文化兴起,继而承秦完成民族统一的历史必然性。<sup>⑤</sup>而后,研究秦汉史的学者大都从文化视角对秦汉统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这些研究者的成果将在后面正文的分析中介绍。

第三个高潮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的研究,其起源于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中华民

① 董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之异同》,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②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后选载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③ 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④ 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⑤ 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